

# 韧性语境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村庄规划

杨贵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是抵御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能力。基于乡村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的概念,阐述了乡村突发公共生态事件、经济事件和社会事件的类型特征,提出了在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中,村庄规划要综合考虑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策略,强调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三生空间”的规划协作,将乡村应急自救和预防控制相结合,以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能力提升作为村庄规划的建设目标,从而为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韧性”“乡村突发公共事件”“三生空间村庄规划”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指导村庄规划和乡村建设行动。

**关键词** 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突发公共事件;村庄规划;乡村社会治理;乡村建设行动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并造成或极有可能导致重大灾害而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根据其发生过程和性质,被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4种主要类型<sup>[1]</sup>。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持续性等特性,对城乡人居环境的安全和人民幸福带来极大挑战,成为城乡规划学科必须直面的议题。

“韧性”是由拉丁语“resillo”转变而来,意思是回归到原来的状态<sup>[2]</sup>。学术界对此概念究竟首先

应用于哪一个领域有争议<sup>[2]</sup>。但总体上,这一概念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应用,都体现出“复原能力”的本质。

进入21世纪,韧性概念在城市问题研究方面获得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2005年世界减灾大会之后,韧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减灾领域的讨论和一些干预措施中,并逐渐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开辟了灾害应对方式的新领域<sup>[2]</sup>。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ies)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学术界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和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话题<sup>[3]</sup>。作为应对城市危机的新思路,这一概念所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受到国内

收稿日期:2020-06-30;修回日期:2021-03-01

基金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878459)

作者简介:杨贵庆,教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社区规划建设、城市规划社会学、乡村振兴与传统村落再生等,电子信箱:yguiqing@163.com

引用格式:杨贵庆. 韧性语境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村庄规划[J]. 科技导报, 2021, 39(5): 74-8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1.05.008

学术界关注。《国际城市规划》在规划领域较早地系统介绍了英美等国关于城市韧性、城市减灾和韧性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进展<sup>[4-7]</sup>。韧性概念进一步推动了之前关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方面的研究,并逐步拓展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例如,王思斌<sup>[8]</sup>把韧性概念转用到社会学领域,论述并建构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关系,指出社会韧性对经济韧性的支持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把韧性概念拓展应用于乡村领域的研究。岳俞余等<sup>[9]</sup>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影响乡村聚落韧性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判断韧性程度,构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发展的框架;陈轶等<sup>[10]</sup>指出在面临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不确定事件冲击时,韧性视角成为研究农村发展的必要理论基础,需要注重农村韧性研究的地方性、阶段性及多尺度性;魏艺<sup>[11]</sup>基于社区韧性的适应性循环理论,总结乡村社区生活空间原有的自适应建构特征,针对多种空间形态提出重构策略;张琦等<sup>[12]</sup>探讨苏北乡村的村庄布局与疫情之下乡村防疫的韧性;雷晓康等<sup>[13]</sup>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李红波<sup>[14]</sup>研究韧性视角下乡村聚落的适应性转型及内在机制,为乡村发展寻求与扰动冲击相耦合的适应性转型路径。总体上,基于韧性视角探讨乡村发展的研究方兴未艾。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何提升乡村自身的韧性水平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当前,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脱贫攻坚全面进入实施乡村振兴阶段。进入202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sup>[15]</sup>,指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为贯彻好新发展理念,从韧性的视角研究村庄规划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从而指导村庄规划建设,提升乡村韧性能力,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本文将“韧性”的概念运用于村庄规划,从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哲学内涵切入,认识乡村突发公共

事件的类型和威胁,并从“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空间”讨论当前村庄规划和长远发展的应对措施,构建“乡村人居环境韧性”“乡村突发公共事件”“三生空间村庄规划”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指导村庄规划和建设。

## 1 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内涵

“韧性”的本质是有一个可忍受、可抵抗的变形受力区间,而一旦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物质状态就会发生破坏和改变。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可知,量变是在保持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基础上的事物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和排列秩序上的变动,是一种渐进连续的变化过程;而质变则根本不同,它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突变,是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准备,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sup>[16]</sup>。

从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看突发公共事件,就可以从现象看本质。所谓突发公共事件就是一种事物质变的过程,是事物的韧性被打破,外部作用力超越了事物发展的合理区间,突破了极限的“度”(限度),从而导致了突发公共事件。因此,根据事物量变和质变的哲学原理,就不难看出突发公共事件在“突发”之前,早已开始酝酿这一质变的连续性渐变过程。当量变达到一定限度时,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无法协调的时候,事物的规定性就无法包容其内部矛盾冲突,从而导致质变,公共事件就突发了。

例如,2007年江苏省太湖爆发的蓝藻污染公共事件,造成无锡城乡生活饮用水严重短缺,各大超市商店里的桶装水被抢购一空<sup>[17]</sup>。这一突发公共事件的起因是水源地附近蓝藻的过量堆积而导致其厌氧分解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氨气、硫醇、硫化氢等异味物质,打破了水体自净作用的极限从而导致生态韧性的破坏<sup>[18]</sup>。又如,湖北武汉近年来在汛期经常被水患所困成为“泽国”,表面上是由于短时间内特大暴雨和地下管网排水能力不足,但根本上是因为长期以来武汉大都市及其周边地区许多

湿地被填埋,让位于城市建设用地开发<sup>[19]</sup>,地表水面面积迅速减少,汛期时地表蓄水滞洪能力大幅下降,导致原有的生态韧性被破坏。

因此,看似突发的公共事件,其本质上是由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是韧性的限度被超越。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不仅是要及时采取应急的措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更要关注长期的韧性能力的建设。

韧性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能力和水平,对于维持乡村连续、渐进发展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和难能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发展可以作为一种能力来建设。借鉴上述王思斌<sup>[8]</sup>关于“社会韧性”的概念,本文将“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定义为:“乡村人居环境结构中具有的,在遭遇突发公共事件破坏性力量时所呈现的,维持乡村生态、经济和社会有效运行的特质。”现阶段,中国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 1.1 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韧性

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韧性是指乡村生态结构中具有的,在遭遇环境污染破坏性力量时所呈现的,维持生态平衡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生态韧性是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本质就是强调生态环境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生态环境基底,就无法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应当看到,中国不同地区乡村生态韧性的能力和水平有较大差距。由于地理气候、地质条件的多样性,各地乡村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参差不齐。一些地方甚至是束手无策;除了自然灾害之外,人为灾害也给乡村生态韧性带来冲击。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工业化虽然给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对污染治理的不力,也给乡村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受快速城镇化发展主要影响的乡村地区,生态环境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难以逆转的。

### 1.2 乡村人居环境的经济韧性

乡村人居环境的经济韧性是指乡村经济结构中具有的,在遭遇产业链破坏性力量时所呈现的,维持基本粮食生产和副食品供给的能力。经济韧

性是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当前乡村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和多样性特征,一些地方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基本上放弃了粮食种植而发展旅游经济,然而,突发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全社会对来自于乡村的粮食、肉、禽、蛋、蔬菜及副食品供给的需求,将会成为最基本、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需求。以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为主导的乡村整体经济运行的适应性和可恢复性,是乡村人居环境经济韧性的核心,它对整个社会安定起到支撑作用。

中国不同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的经济韧性还存在较大差距。虽然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入库数量和品质等在逐年提升,但对照数量巨大的人口基数,乡村经济韧性仍需警钟长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城镇化的数量增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弃农现象”<sup>[20]</sup>,一般来说,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指标的城镇化水平,应该反映与农业现代化同步的进程。即:由于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使得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并转化从事非农产业,如进城务工等。但是,中国城镇化过程并没有出现普遍同步的农业现代化,而是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较大差异,第一、二、三产业的收入水平较大差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巨大差异等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放弃农业而转入城镇谋求更好发展的过程。这导致了一些地区年轻劳动力流失严重、耕地抛荒的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sup>[21]</sup>,截止2019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48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60.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这个数据已逼近一些欧洲发达国家。虽然城镇化率相近,但是中国人均GDP水平与那些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却相差甚远。考虑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弃农现象”,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体质”是比较“虚弱”的。总体来看,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的经济韧性亟待加强。这不仅涉及到粮食问题,而且也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 1.3 乡村人居环境的社会韧性

借鉴王思斌<sup>[3]</sup>关于“社会韧性”的概念,本文把乡村人居环境的社会韧性定义为:乡村社会结构中

具有的,在遭遇破坏性力量所呈现的维持社会融合并促进社会秩序有效运行的能力。社会韧性是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乡村社会人群是否能够有效组织起来,通过努力把灾害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快速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这是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反映。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韧性,那么乡村社会结构就会面临激烈矛盾或冲突,无法保障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应当看到,中国不同地区乡村基层社会韧性的能力存在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问题。从内部来看,乡村基层社会自治水平仍然较弱。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封建社会乡绅阶层治理结构瓦解之后,乡村基层社会结构中的具有内生性的组织力量缺失。生产力发展使得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改变,传统大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族群组织也随之瓦解,加之乡村社会中的“能人”纷纷出走,导致乡村基层社会结构的韧性水平急剧下降。改革开放之后,村委会组织的建设和驻村干部制度逐步建立,有效促进了乡村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培育。但是这种方式仍然由于驻村干部的频繁调换而导致效果的不连续性,再加上驻村干部不具有原住民的身份认可,因而工作的效果难以有效发挥。现阶段,通过基层党组织力量的加强来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希望建构新时代乡村基层社会结构中的灵魂角色。这还有待通过相应的人才振兴政策来夯实组织村民的力量。从外部来看,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有稳定但低效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外部的资金和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乡村。资本逐利的特性难以避免带来乡村内外利益冲突,并激化内部原有的社会矛盾,导致乡村社会韧性的破坏,从而突发乡村公共事件。

## 2 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型与威胁

根据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所列出的突发公共事件4种类型<sup>[1]</sup>,结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本文把乡村突发公共事件分为以下3种类型:突发公共生态事件、突发公共经济事件、

突发公共社会事件。它们对应于上述关于乡村人居环境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内涵。当乡村人居环境韧性遭遇破坏性力量并超越了韧性极限而发生质变,必然导致乡村突发公共事件。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sup>[1]</sup>。

### 2.1 乡村突发公共生态事件

乡村突发公共生态事件主要对应于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突发公共生态事件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破坏力量导致的生态环境灾难,另一类是由于人为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这两类生态事件本质上都是因为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韧性超越了承受限度而崩溃。其中,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破坏力量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人为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事故灾害或灾难包括:水旱灾害(人为导致)、森林草原火灾(人为导致)、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 2.2 乡村突发公共经济事件

乡村突发公共经济事件主要指由于各种突发原因导致乡村生产能力的丧失,使得乡村粮食、肉、禽、蛋和副食品生产供应无法满足自身乃至外部(如城市或区域)的需求,同时也需要从外部输入此类基本保障。乡村突发公共经济事件往往由突发公共生态事件而引发,也可由公共社会事件(如动物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反过来,一旦乡村丧失了农业经济(主要是第一产业种植业)的能力,也可引起突发社会事件。

### 2.3 乡村突发公共社会事件

乡村突发公共社会事件主要包括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和文化保护事件。其中,公共安全事件主要包括诸如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在乡村社会安全事件还可能来自于村与村之间长期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激烈械斗或流血事件。此外,受到快速城镇化影响,加上保护观念缺失和保护方法不当,导致中国一些地方传统村落

和重要地方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遗产)遭到破坏,国家级、省级或地方重点文物和建筑被毁,而引发严重的文化保护事件。

以上关于乡村突发公共事件3种类型的论述,参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sup>[1]</sup>,可归纳为表1。

表1 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类型

名称	本质	原因	分类
突发公共生态事件	生态韧性崩溃	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破坏力	自然灾害: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人为因素	事故灾难: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人为因素导致的水旱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
突发公共经济事件	经济韧性崩溃	乡村生产能力丧失	粮食、肉、禽、蛋和副食品生产供应(新增)
		公共卫生健康受到冲击	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突发公共社会事件	社会韧性崩溃	社会安全受到冲击	社会安全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村与村利益冲突等
		保护观念缺失、保护方法不当	文化保护事件(新增):传统村落大量被拆除、乡村地方物质文化遗产(各级重点文物和建筑构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3类乡村突发公共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往往相互关联并彼此引发。例如,区域大范围洪涝灾害(突发公共生态事件)导致粮食作物等遭遇毁灭性打击(突发公共经济事件),也将导致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损失(突发公共社会事件)。又如,动物疫情导致的猪瘟事件(突发公共社会事件),致使农村生猪养殖产业链遭遇打击(突发公共经济事件),并引发一个时期猪肉价格飙升。

当前中国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令人担忧,必须引起全社会警觉。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空间环境到社会经济秩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隐患。例如,宏观层面,作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需求,乡村的经济韧性十分关键,18亿亩耕地是一个红线、底线。而一些地区受经济增长刺激,城镇建设开发用地不断蚕食耕地,生态韧性受到严峻挑战。在微观层面,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来自村民自身的经济条件、认识水平、保护意识和保护方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各地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传统村落的数量正在急速减少,社会韧性

受到重大威胁。在物质空间环境方面,由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的资金不足,使得中国农业基础设施难以支撑现代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韧性的能力提升受到束缚。为此,2021年2月新华社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sup>[15]</sup>:“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科学划定各类空间管控边界,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此外,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安全隐患威胁着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限度。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修建了不少水库大坝,并规划严格预留了行洪通道。然而,60、70年已经过去,经历了一代人,而新一代安全意识逐渐淡薄。一些行洪通道上已经建起不少村民住房,甚至有一些小学等公共设施也建了起来。一旦水库遇到超越历史预期的洪峰流量而需要开闸放水,那么,在行洪通道上的建筑设施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将遭遇灭顶之灾。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都无法承受此类重创,由此突发的公共事件将导致深重灾难。

### 3 “三生”空间的村庄规划应对

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如爆发突然、预测难度大、后果严重和急需处理等,应对的措施也要求及时和精准。针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在综合分析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首先应当采取“应急性自救”,包括生活(生命)自救、生产自救和生态自救。

基于上述量变和质变之辩证关系的哲学理念,认识到所谓“突发”公共事件,其本质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然转变过程,因此,事物发展过程的预防和控制是治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对于乡村来说,就是要建立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的预防、控制和治理体系。这关乎到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能力建设。通过远近结合、局部和整体相结合,从根本上消除导致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崩溃的隐患。

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能力建设,可针对上述“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的内涵,并结合应对“突发公共生态事件、经济事件和社会事件”的类型,采用“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三生空间”村庄规划应对策略。

#### 3.1 生态空间规划

加强乡村生态空间的韧性,就是要建立乡村人居环境抵御自然灾害的体系,增强面对突发公共生态事件而迅速恢复生态系统再平衡的能力。当前中国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建立国土空间的安全格局。对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就是要从生态安全的根本出发,把可能导致自然灾害对乡村人居环境破坏的隐患加以预防和消除。通过梳理既有的防灾、抗灾设施条件和存在问题,及时把防洪、排涝、抗震、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内容,作为村庄国土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使得村庄处于长期安全稳定发展的规划安排之中。

应当看到,各种自然灾害对于乡村人居环境的破坏具有经常性和周期性特征。这是由于村庄居民点与自然关系更紧密,完全融入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中。同时,其本身也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历史上农耕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少乡村聚落经常遭受自然灾害侵袭损失巨

大,有的甚至是毁灭性的。随着生产力水平提升,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

总体上,中国自然灾害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破坏程度在降低。同时,中国乡村整体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不足,各种人为因素又增加了新的隐患。特别是山地乡村人居环境,因开发山林资源、水资源而新修建的人工设施构筑,破坏了山体长期形成的稳定构造,改变了山洪行洪路径,导致大量村落随时有遭受山体滑坡和洪水侵害的危险,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威胁。此外,大型水库下游位于行洪范围内的村落,也暴露在毫不设防的危险地带,时刻将发生突发公共生态事件。因此,本轮村庄国土空间规划应加强作为安全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意识 and 应对策略。

#### 3.2 生产空间规划

加强乡村生产空间的韧性,具体是要增强乡村人居环境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而快速恢复农业生产自救的能力。关键之一是确保耕地规模和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安全,特别是要加强高产良田的保护和建设。这需要结合村庄上位规划(如乡镇和县域层面)的统筹安排。通过梳理既有的水利设施、供电、农产品加工和储运条件及存在问题,及时把农田水利、道路运输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作为村庄规划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注重肉、禽、蛋、蔬菜和副食品供应链的建设,以及基于地方特色农产品的保护和发展,通过区域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夯实乡村生产空间的坚实平台。

乡村人居环境的生产空间安排应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避免因各种农业生产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韧性的破坏。特别是在生态敏感地区的农业生产尤其需要重视这一原则。例如,作为饮用水水源地(水库、湖泊水面等)周边及上游的特定区域,乡村经济生产的类型需要严格控制,避免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3.3 生活空间规划

加强乡村生活空间的韧性,重点要增强乡村人居环境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而维持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的能力。要确保安全和持续可靠的饮用水系

统、应急电力供应系统,并以此预备面对重大灾害灾难的避难场所。通过梳理既有村庄公共设施条件和问题,及时规划建设一处综合性、多功能(或组合型)公共建筑场所。平时可作为商业、文化、教育等多种公共服务和活动功能,而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它又可作为重要的避难和急救场地。

乡村生活空间韧性的提升,需要以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来引领。通过公共场所和地方文化建设的相互结合,以“文化定桩”工作法为引领<sup>[22]</sup>,增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保护、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的目的。

从长远来看,乡村人居环境的社会韧性,还体现于医疗、教育和养老设施等重要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现代化程度。基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下的乡村未来发展预期,如果没有适当的就医、基础教育和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支撑,那么,乡村生活品质则难以提升。一旦乡村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超越了乡村的社会韧性限度,那么将导致突发公共社会事件。除了上述“三生空间”的村庄规划之外,乡村韧性治理能力也十分重要。乡村韧性治理能力不仅是空间规划制定和实施的保障,而且也是协调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利益博弈的支撑。通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提升韧性治理能力水平,从而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做出积极有效的空间响应。

#### 4 提升韧性的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关于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内涵、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类型和“三生空间”村庄规划应对的论述,可以建构这3个方面的关系框图(图1)。其中,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作为核心目标,突发公共事件作为预警红线,而“三生空间”规划作为韧性建设的支撑,以及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控制。

综上所述,在韧性语境下讨论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的村庄规划应对,就是将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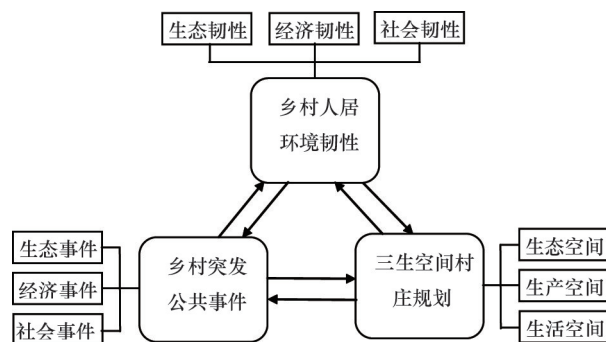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突发公共事件和“三生空间”村庄规划的关系

力和水平作为村庄规划的核心和目标来规划建设。换言之,村庄规划建设就是要不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能力和水平。虽然目前一些乡村人居环境既有的韧性能够抵御过去突发公共事件的挑战,但不一定能够应对未来更复杂、更严峻的威胁。因此,乡村韧性的建设不能被动应对,不能停留在既有的低水平的韧性。相反,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规划建设。一方面需要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需要采用科学方法,运用专业知识,提升韧性的层次和能级。

提升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层次和能级,核心是要加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组织振兴、人才振兴,带动产业振兴,保障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从而全面提升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能力。当然,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提升,更广泛的基础是全社会总体韧性水平的支撑,这还包括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迈进,在国家层面合理有效地调节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异,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遗产,将中国乡村人居环境的地位提升到城乡均衡、城乡平等、城乡共构、城乡共享和城乡共同现代化的新高度。

**致谢:**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房佳琳整理本文部分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EB/

- OL]. [2020-12-12]. [http://www.gov.cn/jrzq/2006-01/08/content\\_150878.htm](http://www.gov.cn/jrzq/2006-01/08/content_150878.htm).
- [2] 张益章, 刘海龙. 韧性概念的重新审视[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13-21.
- [3] 徐江, 邵亦文. 韧性城市: 应对城市危机的新思路[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1-3.
- [4] 秦越, 刘海龙. 从安全防御到安全无忧: 新城市世界的可持续性和韧性[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4-7.
- [5] 曹康, 王金金, 陶舒晨. 韧性规划: 纽带概念抑或末路穷途[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8-12.
- [6] 徐婵. 城市减灾: 创建韧性城市[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22-29.
- [7] 罗震东, 周洋岑. 城市韧性与新奥尔良的复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2): 30-35.
- [8] 王思斌. 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的关系及建构[J]. 探索与争鸣, 2016(3): 4-8.
- [9] 岳俞余, 彭震伟. 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发展研究[J]. 南方建筑, 2018(5): 4-9.
- [10] 陈轶, 李金花, 叶志聪,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韧性研究进展与展望[J]. 小城镇建设, 2019(11): 68-73.
- [11] 魏艺. “韧性”视角下乡村社区生活空间适应性建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11): 50-57.
- [12] 张琦, 付小娜. 疫情背景下韧性乡村建设探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2): 248-249.
- [13] 雷晓康, 汪静.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92-99.
- [14] 李红波.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J]. 地理科学, 2020, 40(4): 63-69.
- [15]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 [2021-02-21].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 [16]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15年修订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17] 太湖面临蓝藻压力[EB/OL]. [2021-01-12]. [https://www.sohu.com/a/149256592\\_660355](https://www.sohu.com/a/149256592_660355).
- [18] 蓝藻之殇: 勿忘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EB/OL]. [2021-01-1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475614-1038963.html>
- [19] 黄利民, 刘成武. 湖北省近代洪涝灾害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1): 115-118.
- [20] 杨贵庆. 城市时代的“危机”因素与应对[J]. 城市规划汇刊, 2001(6): 30-34.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0-12-28].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2006/t20200617\\_1768655.htm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2006/t20200617_1768655.html).
- [22] 杨贵庆, 肖颖禾. 文化定桩: 乡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间营造——浙江黄岩屿头乡沙滩村实践探索[J]. 上海城市规划, 2018(6): 15-21.

## Village planning for responding to public emergencies in the context of resilience

YANG Guiqi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threat of public emergencies in Chinese rural areas should arouse the whole society to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is an important ability to resist public emergencie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rural ecological resilie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social resilience,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ublic ecological emergencies, economic emergencies and social emergencies, proposes that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village planning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response strategies for rural public emergencies, emphasizing the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rural emergency self-rescue with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is the constructional goal of village planning, so as to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ilie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rural public emergency" and "village planning" to guide village planning and rural constructional actions.

**Keywords** resilie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public emergencies; village planning;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rural constructional actions ●



(责任编辑 卫夏雯)